

从世界史观看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

安 长 春

本文以我国世界史学的发展,说明世界史观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至关重要性,同时评介了吴于廑教授对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所作的贡献。

世界史学和历史学的其它任何一门分支学科一样,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从事世界史的研究者和著作者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其所处历史时代和当时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证明了这点。本文拟从我国世界史学发展的简要回顾,谈一谈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说,1949年以前我国的世界历史没有形成专门学科。这种状况既由于对世界史研究的不足,也由于世界史观的局限,而后者又是制约前者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世界史观,世界史观是已知世界地理知识与文化观念的结合物。如中古时期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史观,阿拉伯诸国的伊斯兰教世界史观,以及近代西方的西欧中心世界史观,都是由其所处时代已知世界地理知识与宗教意识或殖民观念相融合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史学也是这样,其世界史观交融着中国古代已知世界地理知识与儒家的文化观念。《史记》一书所记史实的地理范围扩及当时中国人已知的世界,亦即当时的所谓“天下”,司马迁所处时代汉天子统治下的中国。这一“史法”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视中国为天下教化的中心,中心的周边则是有待归化的四方“蛮夷”之域。如果可以把《史记》看作是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知的世界历史,则这一“史法”也就是当时中国史学家的世界史观。在这种史观支配下撰写的中国历代史书,不仅在其记述上详于中国,略于“蛮夷”,在字里行间还流溢着治史者以华夏之尊鄙薄“蛮夷”的历史思想。明代中叶,利马窦来华时带来了西方当时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的士大夫看到这地图既大开眼界,不胜惊奇,但同时又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上感到不那么高兴。从古至今都认为是四方“蛮夷”向往的、居天下教化之中心的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竟只占世界偏东的那么一块地方,这太不象个中心。

到了19世纪,西方殖民势力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中国人在屡遭败创之余,脑海中存在已久的闭塞而又自大的“天下”观也随之破碎,更新了看世界的眼光与观念,开始认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一个不可等闲视之而又不得不与之

打交道的西方世界。为了与这个强有力的世界交往，这才开始产生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要求。在了解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看法虽有歧异与争论，但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国家和东洋日本的历史与现状，毕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随着中国人世界知识的增长，治史者的世界史观也由此而拓宽。尽管这时还不见中国人写的称得上世界历史的史书，可是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主持的译刊《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又广泛寻求资料写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畲著的《瀛环志略》等书，都一一记载着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多少不一、深浅不等的了解与认识。这些人的世界史观显然扩大了，但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中心论在他们的书中依然可见，还未能与传统观念绝缘。魏源认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国”，徐继畲说，“坤輿大地，以中国为主”，仍把中国视为域外诸国景仰的星极。同时，出于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一些资产阶级改革派与革命派历史学家也从外国近代社会政治演变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与革命寻找历史借鉴，以求振兴中华。这种新气象表明，在这些新派史家头脑中，闭塞而自大的传统“天下”观已发生巨大变化，放下了华夏自尊的大架子，开始从外国治乱兴衰的历史中学习经验。

进入20世纪，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规模的大战，世界各地、各国家之间的联系更趋紧密，中国也被卷入由两次大战所推动的世界性交往的潮流之中，为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在20世纪前40多年里，与中国接触最频繁的不外欧美诸国和日本，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和认识更具有迫切性。所以在这期间，中国史学界有了日渐增多的关于欧美国家和日本历史的译著。由梁思成等翻译、梁启超校订的英国作家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一本超越国别、洲别并且具有以进化论为指归的历史思想的著作，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读者中颇有影响。但当时大学历史系一般尚未设置世界史课程，学习本国历史为主，此外只设西洋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等课程，多采用西方人编著的课本。因此，西方的史学观点，特别是近代的史学观点，如西欧中心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在起步中的我国世界史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与酝酿，1949年，周谷城先生写的3卷本《世界通史》问世。这部书开始打破西欧中心论的局限，重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同时不排除某一时期以某一地区为重点。这部不论在史学观点和涵盖内容上都称得上是一部世界史的著作，在新开辟的世界史园地里一枝独秀。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50年代，与百业俱兴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相同步，史学工作者以历史遗留下来的薄弱的底子为起点，努力进行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当时我国全面向苏联学习，世界史也不例外。苏联的世界史著作一本一本地翻译成中文，尤其是苏联科学院编著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中译本的出版，苏联的世界史观以及由此所构筑的世界史著作体系，也随之全盘被介绍进来。因此，50年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世界史学的移植。许许多多的史学工作者为这一移植工作倾注了心血。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起来了。60年代初，由周一良、吴于廑两位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出版，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世界通史》成书于一批学者之手，而为之直接或间接作学术准备的，还有一大批在书上不见署名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它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与劳绩。自此，我们有了一部由中国学者编著的、上自人类起源下至20世纪之初的大型世界历史著作。这部书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历史，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尽力克服西欧中心论与

民族沙文主义,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这部书问世后几次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达40多万部,至今仍为其他同类编著所不及。这部书作为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被普遍采用,其学术权威地位历30余年而不衰。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历史系毕业生,其所掌握的世界历史知识,几乎无不受惠于这部通史。这部书在社会上也享有很高的学术信誉,为有心于了解世界历史者所广泛阅读。

移植进来的苏联世界史学,有其可取之处。苏联科学院组织数以百计的学者编成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类历史上更迭发展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为主线,分期分段叙述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以此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全书资料丰富,其中不少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有良好影响。但是,苏联世界史学也带有不容忽视的缺陷,它没有突破西欧中心论的局限,仍然沿袭以欧洲为主体的历史分期,并以此作为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总的分期框架,似乎早自“古典奴隶制时期”开始,欧洲就在全世界各个时期历史上都处于领先的中心地位;它也没有能够摆脱西方史学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往往夸大以至美化自帝俄至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在编著体系上,则过分拘守五阶段的分期架构,把许多国家民族的历史分段填入,削足适履,不足以反映和说明人类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全部历程。

因此,为了更好地在我国建立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世界史这一学科,就得排除两种外来史学观点的不良影响,一是西欧中心论,一是苏联史学中的上述缺陷和弊端。

三

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国史学界已注意清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西欧中心论之不当,不仅在于它的非科学性,还在于这种观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体系在史学中的反映,这在史学界容易取得共识。从50年代开始,或在讲坛上,或在报刊文章中,都已对西欧中心论作了批判。但对于来自苏联史学的缺陷和弊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都看得很清楚。这一方面因为消化一种外来的东西,免不了需要一个细加咀嚼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在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时那种大气候下,不可能对苏联世界史学进行仔细端详与审视。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开始从多方面反思向苏联学习的得失。世界史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苏联史学弊端在我国世界史学科之存在,并考虑如何方能清除。“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由六所高等院校发起,在芜湖召开的一次世界史学术会议上,提出并讨论了怎样编写一部新的世界通史的问题。会议讨论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要摆脱西方史学和苏联史学的不良影响。解放前引进西方史学,解放后引进苏联史学,多少是在缺乏分辨和独立思考的情况下进行的。摆脱外来史学的不良影响不是笼统排斥外来史学的一切,而是应当进行分辨和思考,取长补短,经过探索和研究,力求形成一种基于对人类全局认识的世界史观,据此建立起一套世界史著作体系。在芜湖学术会议后的几年之内,由20多所高等院校编写的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先后出版,林志纯教授主编的上下册《世界上古史纲》在此前后问世,表明世界史学工作者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历史著作体系的努力。我国世界史学科在走过了漫长的追随外来史学的路程之后,从此走上了有能力足以自立的比较成熟的阶段。

与此同时,其它史学工作者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在这些人中间,吴于廑先生的思考显得新颖而开阔。吴先生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与周一良先生一起主编《世界通史》,对外来史学观点影响我国世界史学的情况所知更多、体会尤深。《世界通史》主编工作一脱手,吴先

生就进入了如何消除这些影响的思考和研究,并酝酿和构思新的世界史著作体系。1964年吴先生发表在《江汉论坛》上的《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论点》是一篇较早批评西欧中心论的文章。吴先生考虑更多的则是苏联史学中的某些缺失及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影响。1978年,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全国文科教材会上,吴先生作题为《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的学术报告,系统分析了体现于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中的世界史观及这部著作的编纂体系,除肯定其优于西方同类著作的特色外,着重指出它的缺点是,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下,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而这正是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世界史的主题。苏联世界史著作体系,似乎对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均无疏漏,但这种排列与堆积不能构成一个世界历史的整体。世界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个局部历史相加而得的总和。议论苏联世界史学的短长,在1978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但公开对之作系统评说的,却自吴先生这次学术报告始。因此,吴先生的评论为人们所瞩目。

吴先生和周一良先生常说,他们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有苏联世界史观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参照了苏联的世界史编著体系。认识和清除自身的缺点,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建设一门经自己独立研究的、科学的世界史学科。如何建设这一学科,吴先生认为必须摆脱沿习已久的世界史旧格局,寻找另外的途径。因此,吴先生1978年那次学术报告侧重点不在于“破”而在于“立”,用更多的言语述说了他的世界史观及其所构思的世界史体系。由于是首次提出和学术报告受时间限制,吴先生这次对新的世界史观的阐述是比较简要的。过了5年之后的1983年,吴先生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演讲,开始了他5年前提出的世界史观与世界史体系的系统论述。从那以后,吴先生连续撰写《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3篇文章,与《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构成一组内容相连的论文。同时,吴先生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写了概观性条目《世界历史》,在1985年呼和浩特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的发言。此外,还主编了《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并为之写了长序。吴先生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以10余万言,把他对世界史观与世界历史体系的构思展示了出来。这10年已是吴先生从7旬至8旬的古稀之年。自1987年起,吴先生在间隔不长的时间里,动过3次大手术,接受过预防性化疗,很多日子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吴先生以高龄抱病之身,在病榻上,仍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呕心沥血,持续不辍。凡知此情形者,莫不为吴先生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泛起敬重之情。

吴先生世界史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体说来,是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两段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吴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论述有很深刻的含义,应当引起世界史研究者的注意。前一段论述的意思是说,世界历史不是自始就是世界性的,它并非一直存在;世界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所以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后一段论述可以看作前一段论述的注释,说明世界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吴先生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表述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理解,并据此形成了他的世界史

观,其要点如下:

1、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其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与描述。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与趋向。探索的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

2、世界史需要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知识作为探索其自身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世界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其探索目标要求从多方面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历史,但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历史的总汇。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视为两门并列学科的概念,把国别史与世界史并列的概念,把世界史视为国别史总汇的概念,都是不恰当的。世界史的探索目标不等于各国别史相加起来的目标。

3、世界史学科的内容、任务、目标等决定了它排斥一切基于民族或意识形态偏见而以某一国家或某地区为世界历史中心的观点,如西欧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等等,这就要求从事世界历史的研究者必须超越民族或意识形态狭隘性,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全局。

4、一部世界史著作不宜只讲或主要只讲客观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世界史这门学科应以探索和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为主题。不认真对待人类各民族原始闭关自守状态怎样逐步打破和趋向密切联系的问题,就很难对世界的过去,对世界何以有今天,何以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作出充分的、切合客观实际的说明。

5、历史由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向彼此密切联系形成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有次序的发展,这是纵向的发展;另一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而日益增长的各民族和各地区间的接触、交往、矛盾、冲击以及彼此之间的吸收与融合,这是横向的发展。为了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必须对这两方面的发展给予足够的、相应的重视。

6、研究世界史须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观察问题的视野要开阔,研究的问题要具体。就事论事不免失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脱离具体事物讲宏观则必流于空泛。要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但不可离开具体问题的研究,否则无助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吴先生自知按他的上述看法,从全局来考察与研究世界历史殊非易事。他选定对15、16世纪的研究作为使其设想逐步变成现实的着手之点。为此,他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组建了一个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从全局着眼,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两个世纪里,世界海道大通,世界各大洲由此联系起来。同时,率先在西欧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以其超越前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方式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随着海上商路的开拓,伸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由此逐步联成一气,过去各民族原始闭关状态,从此空前突破,人类历史也由此发生了空前的重大转折,“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基于这样的理由,吴先生主持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开展以这两个世纪为主要课题的探索性研究。研究这两个世纪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回首可以上溯至远古,理解世界历史之怎样演进,展望可以目及至于今天,理解400年来世界何以会是现在这个格局。历史研究者站立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15、16世纪,瞻前顾后,环视四方,把历史纵横贯通起来,是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一个必要开端。因此,15、16世纪是一个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诱人的课题。10余年来,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限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若干国家,着手的问题及于封建农本经济的

变化、海上交通和贸易以及宗教变革等。封建农本经济的变化,与突破狭隘的自给的地方闭塞有关,海上交通贸易,事关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大洲之间闭塞的突破,而研究闭塞的突破,正是为了说明15、16世纪历史的重大转折。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宗教意识形态的变化,触及农本经济变化中旧的传统观念的动摇,也与说明这时期重大转折有关。研究这些问题已取得的成果,验证了吴先生设想的正确性。吴先生主编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用亦图亦史的形式,叙述世界历史自古迄今的行程,吴先生的世界史观由此而初步具体化。

50年代以来,人们习惯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史作为外国史的代称,实际上成了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域外史。吴先生所阐述的世界史观,限定了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规定了它的内容、任务与目标以及研究方法,与过去比较流行的世界史概念迥然不同,同时也克服了西欧中心论与苏联史学的一些弊端,因此,可以称之为世界史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在我国史学界已广为人知,引起了巨大反响。依照这一新概念或受其影响而编著的世界史著作已出版多种,在一些著作和史学论文里还可以看到新概念的影子,沿用已久的世界史著作体系也因此而改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陈洪进老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称誉吴先生的世界史观是“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①。更多的人把吴先生的世界史观名为宏观史学,高屋建瓴,博大恢弘,提纲挈领。作为一种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不限于世界史,用来研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同样能够使人豁然开朗,学有新意,出现一个新的境界。实践业已证明,此说不无道理。吴先生世界史观的提出,是我国世界史学独立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

80年代,我国世界史学界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新气象。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三位著名学者在《光明日报》撰文呼吁,加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国家教委支持此举,拨出专项费用,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工作已卓见成效。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旧的学术话题,再次提出,重新掀起争论的波澜。《史学理论研究》的创办,提供了一个探讨与交流史学理论的园地。《世界历史》杂志开辟专栏,就编著什么样的世界史问题开展讨论。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表达了不少富于启发意义的见解。论题涉及世界史观、著作体系与史笔文风。对这一主题在刊物上展开如此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几十年来所仅见。这次讨论实际上设计和描绘了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景。一些世界断代史、专题史、地区国别史学会成立,组织了学术交流。以上这些学术活动与举措,推动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80年代新编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数量比以前增多,在清除外来史学观点不良影响与探索和运用新的世界史观方面各有明显的进步,并吸收了国内外多学科新近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新编世界史著作中,由吴于廑、齐世荣两位教授主编和一批学者担任分册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不仅规模浩大,内容丰富,而且力图贯彻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观。这部书已出版近代部分两卷,待全书出齐后,希望能够展现我国史学界当前对世界史的认识与研究的新水平。

从以上简要回顾我国世界史学的发展可知,世界史观的状况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至为密切。古代的中国中心论制约着历代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近代以来外来的史学观点,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起步与形成,造成了一些可取的与不可取的影响。在经历了这些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之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毕竟自主地建设起来了,成了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我国世界史学科已有的进步,它尚处于迈向成熟的阶段。我们不仅要继续清除外来史学不良的影响,还要努力吸取外国史学观点中有益的东西,从而不断完善我们的世界史观,使之更具科学性。同时还要看到,运用新的世界史观,构筑一个严谨的世界史著作体系,也有待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共同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

(转第5页)

思路撰写出真正的世界史著作,还需要作群体的长期努力。而且由于资料短缺,语言条件不足,起点较低,理论准备不够,即使在单个问题的具体研究上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我认为吴老的说法不是一般的谦逊之辞,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但是我想说,任何科学领域中的革命性的进步,都开始于问题的转换和研究方法更新。没有这种转换和更新,革命性的科学硕果就无从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拓荒者的功绩比后继者的功绩更大。我认为,吴老在世界史学科中的巨大功绩正在于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披荆斩棘的拓荒者。同时,他还多次表示,在学术问题上必须百家争鸣,不能以权威为据,只能以真理为宗。因此,他热烈欢迎学术界对他的见解提出不同的意见。

吴老不是一位以为学术而学术自诩的书斋式的学者,他的锲而不舍的学术工作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活动是与他崇高的政治理想分不开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留学回国后,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了民主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自觉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一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他积极热情地担任各种行政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爱护青年,奖掖后学。无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他都坚信党的事业必然胜利。这样,他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历程,从爱国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现在,他以耄耋之年,仍然不知疲倦地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殚精竭虑,这种精神是特别令人钦佩的。吴老走过的道路,理应成为我们后辈的榜样。

祝“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

(接第 18 页)

人到 30 而立,40 而不惑,50 而知天命,这种说法在我国相传已久。说来也许是巧合,当 70 年代末,即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之际,我国世界史学经过对以往接受外来史学若干片面以至错误理论观点的反思,逐渐清除这类观点的影响,步入了自立的年代。到 80 年代末,也就是新中国 40 周年的时候,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形成了自己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并按自己的世界史观新编了一些世界史著作,这表明世界史学科不再惑于外来史学观点的影响,到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趋向成熟的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本世纪结束,新中国欢度 50 周年时,我国世界史学科将会进入“50 而知天命”之年,自觉遵循史学发展规律,在科学的世界史观指导下,走向辉煌的未来。吴于廑先生在展望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前景时有这样几句话:“凡属前景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现在谈我国研究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前景,其依稀在望的情景也是这样。”^②

注 释:

① 《读书》,1992 年第 2 期。

② 见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一文,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 年第 6 期。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